

流动性:理解现代家庭教育的新视角

辛治洋

【摘要】“流动性”是中国现代家庭和家庭教育的普遍特征,包含家庭生命周期和居所的变动、家庭亲子结构和夫妻结构的复杂与多元、家庭关系的变化与变形,以及家庭功能的流变等。一方面,家庭迎合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而处于流动状态。另一方面,家庭又成了社会变革及其风险的避风港。在分与合的双重作用力下,家庭呈现出“点—网”联合体特征,家变得轻盈而流动,但又不至于流失和流散。无论是观察和理解家庭教育的方式,还是治理和支持家庭教育的政策,都应该随着家庭的流动性特征而及时就位和发挥作用。

【关键词】 家庭教育;方法论;流动性;“点—网”家庭联合体

家庭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承载着重要的且不可替代的功能。正如众多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家代表着平安、团聚、陪伴、关爱和牵挂。与世间万事万物的流逝相比,家,无论指物质意义上的居所、社会意义上的团聚还是心理意义上的港湾,都寄托着安定祥和的想象。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形式和价值基础,每一个人对家都有自幼至老身心两面的天然依赖,家是人类安全感的主要来源,^①能使社会成年人的性格具有稳定性。^②当然,很多学者也注意到,家庭结构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生了深刻变化。古德认为,社会正在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变,家庭正在从扩大的血亲家庭制度向夫妻式家庭制度转变。^③伯杰等认为,现代化并没有导致自由和个人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相反,它导致了“无家”意识、绝望感、挫折感和失范感的滋生。^④

与西方家庭进程类似,“家庭组成的变化往往适应着社会变革的进程,而不是引起和刺激社会变革。”^⑤但我们也注意到,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家庭结构和功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家庭制度强调团体利益高于个人需要,这一点对现代家庭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⑥“天伦之乐”的理想并没

辛治洋,教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芜湖 241000)。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家庭结构新变动及其教育功能的时代定位研究”(BAA220166)的阶段性成果。

①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55页。

②转引自[美]J. 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潘允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1页。鲁本·希尔、阿尔文·M. 卡茨和理查德·L. 辛普森在《婚姻家庭研究中的一个发现:一个客观和进步的陈述》(载《婚姻与家庭生活》1957年第11期)一文中提出了“制度—历史,相互作用—角色分析,结构—功能,情境—心理环境,专门理论—一般理论,家庭经济—家庭管理和家庭发展或家庭生命周期方法”的家庭分析框架。1960年,在希尔和汉森所发表的《家庭研究中概念框架使用的鉴别》中,提供了“相互作用的,结构功能的,情境的,制度的和发展的”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假设。

③[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李茹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41页。

④[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第51页。

⑤[奥]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欧洲家庭史:中世纪至今的父权制到伙伴关系》,赵世玲、赵世瑜、周尚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⑥[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第389页。

有消失,有时还处在社会价值观念的主体地位上^①。可以说,有两种力量影响着中国家庭结构:一种是分家的力量,另一种是合家的力量。两种力量相互牵扯,在不同的家庭里有不同的表现,不能从整体上说谁占上风。学者认为,转变中的中国家庭结构越来越简单,以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形成了区位中心^②,围绕区位中心存在多重变形和变种,也衍生出直系组家庭^③和家庭网^④等补充形态。转变后的家庭职能呈现双重反向运动,即家庭的私人化和私密化与家庭的“社会化”同步发生。^⑤ 上述研究认为,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家庭结构与功能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从结构复杂、论资排辈、功能齐全等形态过渡到结构简单、人格平等、功能单一的形态。但无一例外,都将新旧两种形态视为超级稳定的家庭形态。

已经有少量研究关注到家庭流动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有研究成果关注到现代化进程中流动儿童的“家庭”“家乡”认知以及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经历着复杂的家庭分离和重组,对家的感知是一种流动、变化的地方感知^⑥,在空间上体现出“家”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⑦ 有研究者借鉴亨廷顿对于移民研究的三种类型(旅居者、归附者和双重忠诚者)的分析框架,认为流动家庭和流动儿童很难形成对城市的归附,具有显著的不稳定性特征。^⑧ 尽管如此,也有研究者发现,流动儿童拥有构建“家”空间的能动性和策略,尽力维护整个家庭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⑨ 上述研究集中分析了进城务工人员 and 随迁子女的家庭空间和认知的不稳定性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流动家庭和流动儿童的普遍性问题。

然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流动性”不只是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特殊情况,而应该被定义为中国现代家庭的普遍特征。流动不只是暂时性住址的变化,或其带来的心态的变化,而应该是中国家庭的现代结构性和功能性特征。我们再也不能将家庭视为一个静态的稳定的结构单位,而应看到其在时空上的迁徙、结构上的调整、关系上的解构和功能上的变动,这种流动性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儿童的成长和教育环境。换句话说,“流动性”是现代中国家庭的普遍性特征、“流动家庭”是现代中国家庭的代名词。我们只有在这个新视角下,才能理解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脆弱、韧性与活力的复杂状态,也才能以正确的视角理解中国现代儿童所遭遇的家庭状况,并积极应对之。文献显示,吴小英已经部分地揭示了家庭的流动性特征^⑩,受其启发,本文基于儿童成长和家庭教育视角,进一步丰富其流动的表征,揭示家庭流而不散的原因,概述新视角之于家庭教育方法论和政策的启示。需要说明的是,家庭教育作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所论及的现代家庭的流动性特征既深刻地影响到了家庭教育,其自身也是现代家庭教育的特征。

一、流动性:现代家庭的现实表征

“流动”,一般指液体或气体在空间上的移动,有时也指位置的变换。如果受到外力的作用,液体

①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220—231页。

②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第236—237页。

③王跃生将以夫妇为基础、以亲子为纽带、形式上分异独立的直系存世成员所组成的亲属组织称为直系组家庭。参见王跃生:《直系组家庭:当代家庭形态和代际关系分析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④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第239—246页。

⑤吴重涵、张俊、刘莎莎:《现代家庭教育:原型与变迁》,《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

⑥朱晓丹、叶超:《“理想的家就是普通的家”——上海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实证分析》,《人文地理》2022年第3期。

⑦陈淳、袁振杰、朱站:《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地理学报》2018年第12期。

⑧周怡:《“家”与“家乡”:流动者的乡土情感——“留洋流动”与“农民工流动”的比较》,《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⑨陈淳、袁振杰、朱站:《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⑩吴小英:《流动性:一个理解家庭的新框架》,《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和气体就会在外形上处于一种连续的变化状态,“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①。社会学有“社会流动”的概念,它指人口在地理空间、人际关系、工作和职业、社会阶层以及教育方面的连续变动等。^②也有学者赋予“流动”更为宽泛的定义,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性经历了由“固体阶段”向“液体阶段”的过渡,并用《流动的现代性》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流动状态。基于此,现代家庭的流动性特征可以从物理、社会和功能三个层面进行观察。

(一) 现代家庭在物理层面上的流动性

现代家庭在物理层面上是家庭成员活动的场所,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流动性。在时间方面,最早由希尔和汉森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传统家庭也同样具有解释力。在中国,“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等俗语,形象地反映了家庭的代际更替和成员变动。基于这种稳定的家庭新陈代谢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了相关的伦理话语,例如“养儿防老”“早生贵子”“儿孙满堂”,甚至还有“四世同堂”等俗语传递出试图延缓收缩、空巢、解体等演变过程的美好期待。然而,现代中国家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范围。例如,我国越来越多的离异家庭、无孩家庭、重组家庭等多样化家庭类型都未能在该理论中得到反映,独子家庭也直接跳过了收缩环节,家庭周期明显缩短。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比较极端但又普遍的情况是,夫妻双方打工时认识并结婚生子后,男方继续外出打工,女方留守带娃,两地分居带来的婚姻解体风险越来越大。如果男女双方都继续在外打工,孩子就只能与祖辈相依为命。一个家庭组建突然,解体也突然,跟随个体年龄而变动,家庭生命周期的稳定性荡然无存。越来越多的新闻显示,一个地方性的购房、就业、拆迁、教育政策的出台,都可能导致很多家庭通过婚姻状态的变化来寻找最大利益空间。

与此同时,家庭在空间上的变动也成为常态和不可预测。我国的家庭空间流动可以区分为没有回归的流动、回归的流动(打工、照顾)和同城居所流动。每年近千万的大学新生离开父母所在的居住地后,绝大多数几年后会新的城市或环境中安家落户。这是我国目前最大体量的没有回归的流动,与此类类似的还有因婚姻、工作等发生的空间流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与随迁就读子女,包括很多老人进城照料看护(外)孙子女的流动,甚至一些老年人候鸟式的避暑或避寒迁移,大多属于需要回归的流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心城区家庭迁移到生活设施配套更完善的新开发小区,城郊农民的房屋拆迁与进城安置,还有择校和就业等带来的城内迁移等,都属于更短距离的同城居所流动。谁都说不清楚,自己的子女会在哪个地方安家,甚至连自己的下一个居所在哪,都是个未知数。频繁的家庭迁徙与流动制造了“异乡客”,使他们又互为“异乡人”,互相之间需要不停地重塑社会属性和社会资本,并调整个人的心理适应度和社会满意度。

(二) 现代家庭在社会层面上的流动性

现代家庭在社会层面是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总和。我国学者费孝通、潘允康、潘乃谷等^③对家庭结构概念和类型均有研究,这些研究“将亲子关系视为家庭结构类型划分的轴心”,将“亲子关系和婚姻关系构成状况”作为“考察一个家庭结构的基本准则”。然而,传统意义上的以婚姻、血缘、同居共爨、经济共同体为标志的固态家庭正在被日益多样和复杂的流动家庭所取代。“现在家庭的认同,在逻辑关系上,由‘与(and)’变成了‘或(or)’。即只要有婚姻、血缘或居住空间中的任何一项往往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②谢天、周珏、陈咏媛:《流动性与当代中国社会: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代卷首语)》,《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19年第1期。

③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潘允康、潘乃谷:《试论我国城市的家庭和家庭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就可以被视同有了家庭(抛开法律制度的认可,至少在一些民间意识中开始这样看待)。”^①

家庭结构的流动性可以从夫妻结构和亲子结构两方面作出说明。在夫妻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农民工流动造成的弹性家庭。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夫妻共同在外的“离乡式流动家庭”,还是妻子留守的“扎根式流动家庭”,实际上都是最低成本和最有效率的“跨越城乡两域的弹性家庭生活—生活模式”。^②在城市,跨城婚姻越来越多,夫妻双方候鸟式相聚。与此类似的还有因为工作单位距离远,或者工作性质等原因,夫妻双方聚少离多、周期性见面等现象屡见不鲜。家庭亲子结构也呈现出流动性特征。有学者将农民工流动区分为“剥离式流动家庭”和“拆分式流动家庭”。“剥离式流动家庭”,即两代或几代举家外出的农村流动家庭;“拆分式流动家庭”,即只有年轻一代夫妻在外(子女在或不在一起)务工的家庭。拆分式流动家庭的两代人并不分家,实现了跨越城乡的代际合作。^③与此相应的,还有因工作或学习需要带来的子女随迁、父母陪读、祖父母陪伴等多种家庭代际分离现象。而实际上,一旦子女在住宿式上学,就已经开始了新一代的亲子拆分与隔离。拆分式流动家庭常态下是拆分的,拆分是因为满足某些功能需要,但也会因为春节、寒暑假甚至周末进行候鸟式聚会。这种流动性的夫妻结构和亲子结构,彻底颠覆了中国主干式家庭的想象,家庭的每一分子都如同一个移动硬盘,根据功能需要在“家”主机上自如插拔。

传统的家庭关系如马克思所言,“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④美国学者马克·赫特尔将其概括为年龄、性别和亲属关系。这三种因素相互关联、难解难分,限定了个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决定了个人应有的地位和义务、权利及特权。这些因素,尤其是年龄成为家庭和家庭群体中地位与权威等级的基础。最年长的男子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垄断着家庭中所有重要的决策。女子的地位低于所有的男子,然而随着年岁的增加和儿子(不是女儿)的呱呱坠地,她们的地位也随之上升。父母亲监管着子女的言行,年龄和性别决定了不同的地位和职责。^⑤

传统的家庭关系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而逐渐失去其正当性。与传统家庭关系相比,现代家庭关系更突出个人的感受与选择,因为感受不好就可能选择结构解体或关系疏远,因为感受不同而改变曾经因年龄、性别和亲疏产生的不对等权力关系。这正如鲍曼所分析的,“家庭里有孩子,有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但是即使是作为家庭生活核心的家长身份,在离婚的情况下也将面临解体……祖父母不参与儿女任何问题的决策,他们既包含在家庭之内又排除在家庭之外。从孙辈的角度考虑,祖父母的含义取决于个人的决定和选择”^⑥。家庭里谁说了算,谁的利益被放大,在每个家庭的每个生命周期都没有固定答案,家庭从此失去了一劳永逸的权力中心。虽然为了家庭而牺牲小我的行为依旧被称赞和需求,但尊重个体幸福体验已经成了家庭组建、维持、拆分和解体的重要原因。大家“在一起”,是因为大家感觉在一起挺好,而非强制性的、具有伦理压迫感的道义存在。这也足以说明,现代家庭关系是“点”与“点”的关系,个体化感受是“在一起”的内在逻辑,家庭关系随着个体感受的变化而变化 and 变形。

(三) 现代家庭在功能层面的流动性

“任何家庭,不管以什么样的结构类型出现,对个人而言,都是稳定的私人生活的中心,并提供生

①童宗斌:《家庭与家庭结构:概念、类型及其经验准则的反思》,《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07年第10期。

②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③姚俊:《“不分家现象”:农村流动家庭的分家实践与结构再生产——基于结构二重性的分析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5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⑤[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第395页。

⑥[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31页。

理和情感上的满足、生育、儿童抚养和社会化、老人赡养和关怀、个人安全等多方面的功用”^①。然而，现代经济文化结构及其变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家庭功能的实现内容与方式。如家庭成员就业与收入，越来越受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2022年，我国近3亿农民工中外出农民工1.7亿，半数都在第三产业就业。^②类似于农民工，越来越多的职业“渐渐成为经济体系中最廉价、最可变更、最可任意处理的部分”，换单位换职业、“非升即走”等现象屡见不鲜，就业人员“几乎不理解与同事保持持久的联系和加深对工作的感情与承诺具有什么意义”，“往往对自己对工作的忠诚小心翼翼”，这是对劳动市场“灵活多变性”的一种自然反应^③，失去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在家庭生育功能方面，传统的多子多孙观念已被破解，生不生、生多少，既受到宏观人口与经济政策的影响，也受到每个家庭成员的主观体验影响，变得不可控、不可测。在生活和生育功能失去稳定性的同时，有学者指出，家庭的“感情交往职能”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然而，在快节奏、轻别离的现代社会，“感情交往”也成了一种功能性存在，是闲了才有需要，需要时才有价值，随时都可能因家庭结构和关系的变化而拆解。类似的，抚养与赡养，曾经是家庭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因为托儿所、养老院等外包服务，而变得可有可无起来。

可以说，现代家庭是因为特定时间的功能性需要改造家庭结构，而非因为某种较为稳定的家庭结构从而承载相对固定的家庭功能。家庭功能的流动性表现为三个突出方面：一是在某个家庭生命周期，某种功能被突出，其他功能被淡化、转移或外包。如为了生计而进城务工，将赡养父母、抚养幼儿的功能转移给其他家庭成员，甚至是亲戚朋友。二是因某功能实现或功能消失而改变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如祖父母因为孙辈出生和上学而进城承担起照料的责任，一旦孙辈上大学后，祖父母又回到农村单独生活。同样，家庭成员也会因为小孩入学而短暂离开居所到学校边上租房陪读。三是因家庭结构和关系的变化，影响到家庭功能的实现。如从代际更迭来看，子女接受教育的这段时间是一代人家庭结构变更的高峰期，无论是否将子女教育与成长作为其家庭结构变动的重要考虑因素，家庭结构的改变都实质性地影响了家庭教育功能的实现。如果说，现代家庭关系是“点”与“点”的关系，那现代家庭功能就是由各点连接起来的线段所实现。这些线段是随装随拆的，有时密集有时稀疏，这块密集那块稀疏，甚至因为功能实现的需要，传统的家庭概念被突破，有了直系组家庭、家庭网和联合家庭，从而形成了一个并不稳定但又是网状的家庭功能群落。

二、分与合的双重策略：现代家庭为什么是流动而不是流散的？

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④。一方面，家庭迎合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而发生诸多变化，另一方面家庭又成了社会变革及其风险的避风港。前者使得家庭面临着解体的压力，后者又产生了聚拢的力量。在分与合的双重作用力下，家变得轻盈而流动，但又不至于流失和流散。

（一）解除束缚的分家策略

在近代中国，家庭被理解为阻碍国家民族发展、制约救亡图存的负面象征。和平年代，家庭的每

① 邓志伟、徐榕：《家庭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② 《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04-28，https://www.gov.cn/lianbo/2023-04/28/content_5753682.htm?eqid=e8de9f0800144707000000026474a12e，2024-04-01。

③ [英]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253页。

④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81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在第二章“家庭”的起源当中，我也发现了家庭的起源和生产也存在紧密联系。文章中提到摩尔根的一句话：“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向较高的形式……”充分地印证了家庭的起源也不是凭空而来，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逐渐地产生。

一个个体未必像革命者一样将家庭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到一起作思考,但一定会从行为独立与自由、物质财富成功等利益追求、减少麻烦的角度理解家庭对于自身的功能价值。

1. 解除家对个人自由的束缚

在当下的中国,每个人都想按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这种以自由为旨趣的个体化思维方式,是“个体化社会”的“社会个体化”,其必然需要从家庭共同体中脱离出来,使标准人生变成选择性人生,使家庭关系变成一种选择性关系。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后,个体化已经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用鲍曼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命运,而非一个选择”^①。具有中国特殊性的是,它已经由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化,走向了以个人为单位的个体化。每个人逐渐取代每个家庭,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国家法律和制度建设的基石。

自由是个体化的目的,个体化是自由的依凭。相对于家庭束缚,自由首先是选择自由,排斥循规蹈矩。在个人选择面前,家庭的传统、父辈的要求和祖宗的故事都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都可以不听。自由也是个体行动自由,排斥家庭成员必然同财共灶的心理暗示,个体可以根据功能需要,暂时性离家寄居外地,也可以跨城跨户持久性分灶,还可以在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保持财务独立。可见,个人选择了自由,也就选择了家庭的不确定性和确定的暂时性。

个人选择了自由,个人也就选择了自由的责任和代价。此过程,既让家庭摆脱了“不能承受之重”,也让个体发现了自我方案的价值和责任感。正向地说,解除家庭对个体的束缚,即赋予了个人勇气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为他自己行事——而不是一旦他们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们就可以一起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获得什么”。反向地说,从此以后,“疾病是个人的,治疗也是如此;困厄是私人的,解除困厄的方法也是私人的”^②,个人从此就像上了跑步机,目标不一定明确,但必须不停奔跑。这种奔跑可能是积极主动的,也可能是被裹挟的,一旦启动,就只能继续下去,“对(地位、权利和生计的)不可靠性,(对于它们的持续性和未来的稳定性而言的)不确定性和(人们的身体、自我及其延伸即财产、邻里关系和共同体)不安全的联合体验”^③,这些都是个体停不下来的原因,也是家庭变得松散和流动的原因。

2. 更加轻盈地追求成功的需要

当下,既是一个物质丰裕、充满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永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更多财富、更高地位和更大成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始终对现状处于不满意状态,总是有更为远大的发展目标,更新的指标体系、更多的发展举措和更为可见的发展路径在刺激着大家积极行动,追求每一个阶段的最佳效果。在这种社会心态下,每个人都不会太在乎他身居的环境、与周遭的关系,除非这本身被设计为成功的目标。相对于成功,工作单位、社会社区乃至家庭生活,对于奋斗者本人而言,都终归是暂时的栖息地和加油站。“现代社会的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性质越来越淡化,而作为消费单位的性质却越来越巩固”^④。现代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被消费的单位,在消费者面前,家庭是消耗品和随时可替换的工具。

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是“陪着你慢慢变老的”和守着你“静待花开”的历程,是不能“整天不回家”而要“常回家看看”的场所,是“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联系。家庭的这些特性需要个体时间、空间和情感的消耗,而这对于追逐成功的个体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拖累。现代社会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机会似乎给了每一个人,大家都能看到终点,又都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冲刺,“谁运动和行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73—74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120页。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265—266页。

④辛治洋、戴红宇:《家庭教育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定位》,《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年第6期。

动得更快,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最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而且正是那些不能同样迅速地运动的人,更为明显的是,正是那些更为根本不能随意地离开他们的地方的那类人,在被别人统治着。”^①为了成功,为了赢得统治机会,参与者不得不各自装备加速武器和解除羁绊轻装上阵。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家庭在充当加油站的同时,也是个体追求成功路上的绊脚石,若是后者则难免需要抹平甚至被踢开。

3. 家庭功能外包导致家庭束缚减少

外包本是商业用语,指企业为维持组织竞争核心能力,将组织的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外部的专业公司,利用企业外部的资源为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经营服务。^②在现代化进程中,原本属于家庭的许多功能已经外包给社会,这种外包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技术或内容外包。如家政、家居装修、学科辅导、老人赡养、儿童托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本身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复杂性,社会上有专门公司和职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二是功能转移。读书地点从私塾到现代学校,从家庭纺纱织布到企业制衣,从家庭种菜养猪到菜市场买菜,从家庭厨房到单位食堂甚至快餐外卖,等等,这些原本属于家庭自带的生产功能都被转移到了社会专门行业。

家庭能够外包的功能越多,个体对家庭的需求也就越少,家庭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也就越弱。与之相应的是,家庭对个体的束缚和要求也就越来越简单和轻便。具体来说,家庭功能的日益外包将直接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因为外包带来的家庭责任心的减弱。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人形象地将其描述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结合。在家庭教育领域,有效市场加速了家庭功能的外包,有为政府为家庭责任缺失兜底。兜底可以促进和保障市场化,但也可以造成责任心的减弱。二是习惯性外包,也会对家庭产生视觉迁移,认为家庭自身也可以被鉴别、触摸、把玩和购买,从而将家庭工具化,降低其在个体信念中的目的性价值。上述两方面影响也是家庭功能流动性的表现,其最终都会减弱家庭对个体的束缚性,从而实现个体的流动自由。

(二) 需求依赖的联合策略

当然,影响家庭的不只是独立的、分家的力量和策略。流动性给个体带来孤独、冷漠、无助感,以及生存和发展的风险的同时,个体也产生了稳定性和联合性的诉求。在这方面,家庭因其血缘和共同经济基础的特性,天然地成了应对孤独和风险的最佳自然联合体。

1. 情感依偎的联合诉求

现代社会个体化意识的生长以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和人情关系为前提。费孝通将传统社会称之为“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具体来说,这种可靠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熟人社会是“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③因为知根知底,所以无所畏惧。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礼记·祭统》将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与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这深刻地规定和揭示了中国几千年稳定的社会架构。在熟悉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社会架构中,个人的存在和价值是被熟悉的场景和浸染的关系所定义,稳定而又可靠。

然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作为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开始和结束都同样突然的、意外相遇的场景中”,不需要对曾经的相遇产生共同回忆,也无需为下一次相遇建立共同目标和规则,因为“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④。缺少共同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205页。

②詹晓宁、邢厚媛:《服务外包:发展趋势与承接战略》,《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第4期。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④[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167页。

记忆和共同理想的陌生人的现在,自然也是摇摆不定、缺少信任和可靠性的。

家庭是中国人医治孤独和隔膜的良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天然地具有共同记忆。“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各本于父母”这一“自然之理”^①,上一代人的现在就是下一代人的过去。男女双方组成家庭,一般情况都是以爱情的名义开始,以“搭伴过日子”为日常。由此构成的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最基本关系,以感性而非理性、默契而非权衡、亲密而非疏远为家庭的最强吸引力,自觉克服契约感和孤独感,成为现代个体社会“陌生人”梦寐以求的安全避风港和舒适温柔乡。

2. 消费社会的功能支持

家庭首先是经济单位。“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是家长制家庭的生产形态和基本特征,^②“血缘关系所内在的亲疏远近和内外之别,对于经济伦理有着决定性影响”。^③在传统中国,家是基本的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除非迫不得已,谁都不会主动离开家,离开家则会带来诸多的不便。穷家富路,指的是出门要多带盘缠,在家手头拮据些也没多大关系。虽然出门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养家,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又成了最有条件包容和接纳穷困潦倒的地方。

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家庭能为家庭成员的消费提供支持。这种支持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家庭已经演化为家庭成员的符号消费品。现代社会的家庭功能演化为两个方面的供给。一方面,家庭除一般生活功能外,还能在某位具体的家庭成员在特定时空中提供特殊服务,比如妇女坐月子、小孩保育、老人赡养等;另一方面,家庭逐渐成为符号,具有直接使用价值之外的其他价值,如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象征。“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④成家立业,依然是个体生命周期中的重要环节。个体如果没有健全的家庭,在社会舆论中也就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完整的幸福人生。第二,家庭能解决国家和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现代国家对家庭的支持一是保障兜底,二是给足公平机会。同时,市场精细分工也让家庭能从很多繁琐的生产生活功能中抽身出来。然而,国家支持和社会协调取代不了家庭责任。以家庭教育为例,亲子陪伴的共同参与、日常生活的相机而教、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等感情的黏合、生活活力的激发和安全感的获得,都是第三者无法给予的。第三,家庭能有效化解个体“贫困”。按鲍德里亚的观点,现代个体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会陷入“匮乏”和“消费”的无限循环中,而这种贫困与不足“归根到底,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个体之间是无边界的交流圈,“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与他人比较的时候被相对化了”^⑤。相反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的是有限交流圈,也是无区分性的交流圈,家庭关系的透明性和互补性确立了家庭成员的信心,实现了需求的缓冲和吸纳,能促使他们在饥饿之中体验丰盛。换句话说,贫困被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所定义,唯有家庭能发挥结构性替代和腾挪作用。

(三)“点一网”家庭联合体:流而不散的结构特征

现代家庭在流动的现代性面前进退维谷。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个体迫切地希望摆脱传统家庭的束缚紧跟时代潮流;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捉摸不透又让个体希望能退守家庭。家庭一方面是个体走向现代性面临的巨大风险,另一方面又是个体应对风险的联合体。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个体并非不要家庭,而是需要一个更为灵活、多元和开放的家庭,即流动家庭。流动家庭流而不散,流是不可逆的社会和个体走向,不散是家庭的自然属性和功能需求。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③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④[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⑤[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48—49页。

已经有研究者提出了家庭研究视角的转型。如沈奕斐使用“个体家庭”的概念来揭示现代家庭中个体与家庭的张力,年轻一代逐渐脱离了家庭主义,每个个体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界定家庭,在自己的利益上选择和决定家庭的结构和关系。个体的选择和决定并非自主决定的,它是在传统和社会变迁交织的背景下,在具体的语境下,在与相关家人的互动、协商、妥协中形成的。与沈奕斐以个体为基础界定家庭相左的是,孙向晨提出了“家”的双重本体论,即“个体”与“亲亲”。孙向晨主张用“个体”与“亲亲”形成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和“公民文教”体系,使之成为我们理解“家”问题的现代框架。上述研究既揭示了个体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家庭中的主体地位,也认为家庭对个体依然具有毋庸置疑的向心力。从家庭结构的视角看,上述研究者所揭示的现代社会个体与家庭的牵连,构成了现代家庭的“点—网”结构。家庭的每一位个体都构成了独特的点,个体与个体之间线段相连,从而不同的家庭形成不同的“点—网”结构。

“点—网”是现代家庭的结构形态,其内涵复杂。从性质来说,可以区分为有机“点—网”结构、机械“点—网”结构和拼接“点—网”结构。(1)这个结构首先是有机的。对于新生一代来说,这是一个先我而生的生活环境和家庭关系,大家在一起生长和生活,并非一个目的性的结合,也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2)这个结构也是机械的。结婚与离婚、守候(如老人帮忙带娃、父母一方陪读、年轻人周期性外出打工)与分开等,都有主观选择的成分,也有阶段性或局部目标。(3)这种结构还可能是拼接的。它基于亲子或夫妻关系,却不一定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也不同爨共财,但却能基于养老、事业和育儿等共同目标组合在一起,也能因为这些共同目标的实现或破灭而解散,从而自由流动,随时进退。学者所称的“轮值家庭”“轮养家庭”“邻住家庭”“拆分家庭”等,就是这类拼接结构的典型代表。

与传统家庭结构相比,“点—网”现代家庭结构形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在家庭成员关系方面,传统家庭关系是完整的亲子关系加夫妻关系,而“点—网”现代家庭关系却可能是不完整甚至是破裂的;在空间上,传统家庭成员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而“点—网”现代家庭却可能聚少离多;在时间上,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被打破,“点—网”现代家庭并不会因为上一辈现在“年轻还能带孩子”而准时生孩子。概言之,传统家庭结构中“网”是本体,现代家庭结构中“点—网”是双主体。

现代家庭结构的“点—网”的双主体决定了现代家庭的流动性。点有点的主观意志,使得家庭的流动性成为必然;每一张网有每一张网的特点,或各点相连,或以某一个或两个点为中心分散开来。使之能网状相连的,既可能是传统亲子或夫妻关系,也可能是某种相似的目标或方式,还可能是某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家庭的“点—网”结构既能克服差异和冲突,实现散点的聚焦和认同需求;又能保持距离和差异,不至于伤害“点”的个体自由。

三、流动性视角之于家庭教育研究的价值

现代家庭和家庭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定义和支持家庭教育的方式也应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正如鲍曼所言,“在这个时期,处理事情的老办法不再奏效,过去习得和沿袭的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于当今的人类状况”^①。因此,无论是观察和理解家庭教育的方式,还是治理和支持家庭教育的政策,都应该随着家庭的流动性特征而及时就位和发挥作用。

(一) 建构与传统家庭教育的“断裂”视角

与流动性相对应的是稳定性。稳定性指在一个情境中,某些事情比在其他情境中发生的可能性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3页。

要大得多,而其他事情则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稳定意味着可重复、有秩序、能预期、可以控制。稳定性是值得追求的,是家庭幸福的重要指标。然而,社会与制度的重大变革给家庭和家庭教育稳定性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一方面,流动性是家庭教育迎合和适应社会流动、家庭流动的产物,家庭通过流动的方式来完成教育功能,如子女随迁、父母陪读、爷奶陪伴等;另一方面,流动性也是家庭教育应对风险、追求成功的策略,家庭通过流动的教育为家庭流动创造条件。在此意义上,流动性不再是家庭追求稳定性的一个对手,而恰恰成为家庭在追求稳定性过程中的一个帮手和必然引发的效用。基于此,我们要用流动的视角来看待家庭教育,认识到家庭教育的流动性特征,深刻地理解家庭教育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建构性。

非常遗憾的是,人的认知和行动“在任何阶段和任何时间,一直处于‘事后’状态,这也是现代性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①。这种滞后性也体现在现有的家庭教育政策和研究思路中,如将家庭当成社会结构变迁或制度变革的被动接收单位,而没有考虑到家庭的结构和教育功能变化会影响社会进程。流动本身意味着陌生人世界,意味着从伦理世界走向政治世界,意味着个体之于个体的不可靠或有些个体无能力提供他人依靠。家庭和家庭教育政策不能只是给出现的社会危机和风险打补丁,而要积极地将家庭教育带入公共领域,要将教育个体放到一个家庭流动性的框架内,树立包容性和实践性取向的家庭观念,一方面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更充分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适应多元、流动的家庭样态;另一方面兜底家庭教育责任和风险,为不能履职尽责的家庭提供扶持和帮助。

家庭教育研究也常怀传统美德主导下的传统家庭主义价值导向,背离现代家庭的流动性特征。基于传统家庭主义价值导向,“其核心在于强调一种单一的、以家庭集体或整体利益为取向的‘家本位’或者‘家庭主义’的价值观。”^②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家教家风传统,随着社会变革和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流动性变化,教育研究者的家庭伦理预设也应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当社会和家庭本身是流动、多变和有风险的,在传承优良家教家风的同时,家庭教育和个体选择的多样化策略和流动性模式,也需要得到承认和关怀。

(二) 认识现代家庭教育要素的“多元”

流动性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定义了家庭教育的相关要素。首先,流动性赋予了家庭教育目标建构性特征。传统社会家庭教育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人生理想和职业选择上,被称道的是“子承父业”或“某某世家”,强调传承和延续;二是在经验学习和传递上,除曲艺和故事外,大都通过成人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完成,强调权威和榜样;三是在价值定位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外界的变化不足以影响内敛生成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流动性彻底颠覆了传统家庭教育的目标自信。一是时空流动带来了家庭教育目标的不可预见性。高速流动拓宽了家庭成员的视野,很容易将父辈生活定义为短浅偏窄,与之相应的是,在职业选择上,望子成龙取代了子承父业。现实的确如此,往往是父辈从事什么职业,子辈就逃避从事该职业,这种逃避也往往被整个家庭所认同。二是父辈职业和人生的不自信自然也带来了父辈经验的无法传递。现在,祖辈只管生活不管教育已是常态,父母的教育也经常性地通过教培机构或互联网信息替代性地完成。三是由此带来的迷失和空虚感。成功与成才的标准不可捕捉,而是建立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建立在个体不停的努力中。这样,似乎一切都可以在过程中成功实现,然而即便实现都只是过程性的成功,失落感油然而生。

其次,流动性带来了家庭教育内容的多样化。在传统社会,家庭是教育的主要承载体,教育可以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人》,第5页。

^②吴小英:《流动性:一个理解家庭的新框架》。

因为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而发生,也可以因为这些事务而搁置。自然而然,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围绕家庭的生产生活,在抚养抚育的过程中开展。相反的是,现代社会呈现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整体化、全球化等多态特征,都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建构起来的,这也直接造成了现代社会不“顾家”的客观事实。相反,家庭和家庭教育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功能调适,以适应社会的流动与多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家庭教育要养成未成年人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其具体内容涵盖了德智体美劳、心理健康、自我保护等多方面的知识、意识和能力。除此之外,家庭还需要继续提供生理性抚养和社会化教育,委托第三方开展艺体类培训,与正规教育机构开展协同性育人,等等。^①可以说,只要社会有需要,家庭就要提供相应的教育和服务。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是流动的,这就意味着现代家庭和家庭教育需紧跟社会需要,提供多样化的家庭教育服务和支持。

最后,流动性带来了家庭教育支持的关系转向。传统社会的儿童抚养与教育随着家庭生活自然而然发生,宛如一棵树上生长的果实,在家庭的生命周期里适时开花结果,树干也适时供给营养。果实成熟被摘走或掉落,树也不争不抢。换言之,传统家庭是包含养育在内的综合生产单位,家庭养育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物质乃至精神互济,这种养育方式随着家庭生活而发生,是稳定家庭结构中可预期的教育支持。现代社会分离了家庭生活与家庭教育,仿佛两者是彼此独立的两件事,家庭教育是被提醒的、刻意而为的一件事。为了支持家庭教育,家庭需要适时调整家庭结构和关系,将儿童成长当成家庭某段时间的重点工作。然而,只要社会有供给,且自身具有购买力,这种家庭内部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转化为购买社会服务。现代家庭教育和家庭为教育提供的支持服务是功能式而非结构式的。恰恰相反的是,家庭既可能通过结构的拆分和拼接来适应功能需要,也可能通过购买服务来将原本属于家庭提供的支持外包。如此构造出具有一定弹性和韧性的家庭教育支持功能网,该网既能一定程度上抵御和消解风险,又能满足儿童情感和归属感的需要。

（三）关注现代家庭教育的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是家庭和家庭教育的时代特征,这是不可抗拒的事实。然而,流动的家庭和家庭教育所隐藏的危机,也是需要被关注到的客观现象。现代家庭教育的流动性危机在新生一代人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新生一代人以背离祖辈的、经验的、稳定的生活为人生成功的标志,这是一次不可逆的人生冒险。在此人生历程中,现代家庭教育以未来更为理想的生活为目的,以较为厌倦的现代生活为手段,目的与手段相分离,现在与过去相背离,从而形成了普遍的精神分裂状态。在流动性的状况下,新生一代人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也不可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伴随无知感和无力感的是对前途和方向的不自信。可是,现代社会似乎通过流动的方式把机会给了一切人,一旦不成功则意味着是个体失败而非其处境出现了问题,这加重了处境不利者的心理压力,从而形成了要么“躺平”、要么更加“内卷”的社会现象,形成了一种没有着落却在绝望地寻找着落的精神状态。

现代家庭教育的流动性危机还突出地表现在家庭教育支持方面。现代家庭教育一方面通过拼接的家庭教育支持功能网实现,另一方面则尽力通过外包服务来实现。没有稳定的家庭结构,就没有坚固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客观造成了家庭教育支持功能网的韧性限度。作为家庭教育的外包服务,不可避免地陷入两重危机。一是作为消费者的危机。一旦家庭教育工作交给社会,那就意味着将家庭教育成功标准交给社会。所谓“家庭教育的成功”,则一定建立在比较、嫉妒和自我陶醉的基础上,建立在偶然的、自发的、无法预料结果的基础上,成功就是“不停消费”加“消费更多”,恶性循环不可以已。二是作为关系的危机。家庭教育的外包,无论是交给制度化的学校,还是交给服

^①辛治洋、戴红宇:《家庭教育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定位》。

务性机构,其合作关系都是暂时性的。如果家校社的结合不是建立在持久目标和长期努力的基础上,那么家庭与外界的关系将会更突出权责关系和界限分明。家庭既对彼此不完全信任,又充满要求和期待。如果不能带来及时满足,投诉或拒绝等对抗而不是合作就在所难免。

现代家庭教育的流动性危机的第三个表现是广泛而又持久的家庭共同体意识的淡化。现代家庭教育面临的窘境是,父辈生活不值得借鉴,导致亲子之间欠缺共同生活体验;父子两代都在忙碌奔赴个人的最好表现,家庭内部缺少作为教育重要途径的沟通机会。家庭成员在一起更像是为了满足人口再生产、抚养抚育和情感消费的需要,一旦这些需要得到满足,这一共同体也就可以宣告解体。然而,家庭的确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比区域、国家更为普遍,更为自然和永久性的生活单位,是公民的国家与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最为直接、最为直观的经验之所。家庭共同体意识的淡漠会直接影响到新生一代人对公共事业、美好生活和核心价值的冷漠和怀疑。

家庭教育的流动性特征与现代治理的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角提出来,所反映的是家庭教育不再是稳定、固化的状态,不再是被动的安排,而是充满主体性和风险的实践方式。在中国,家庭与社会具有多维而又立体的互动关系,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家庭和家庭教育是流动的,只有将这种流动性及其危机置于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文化传统、制度体系和综合治理中予以考察,才能形成较为全面和客观的科学认识 and 政策支持。

(责任编辑:蒋永华)

Fluidity: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Family Education

XIN Zhiyang

Abstract: “Fluidity” is a common feature of modern families and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It encompasses the changes in the family’s life cycle and its residence,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parent-child structure and spousal structur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form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functions. On the one hand, families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tructure and are in a state of flux; on the other hand, families serve as safe havens against social changes and their associated risks. Under the dual force of separation and combination, families exhib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oint-network” complex. The modern families are becoming light and mobile, but they do not dissipate or scatter. Not only the way of observing and understanding family education but also the policy of governing and supporting it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fluidity of modern families and promptly come into play.

Keywords: family education; methodology; fluidity; “point-network” family complex

About the author: XIN Zhiyang,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